

区际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 基于“推-拉”模型的分析*

王树华 刘志彪

内容提要 区际产业转移是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有序推进区际产业转移需要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改进后的“推力-拉力-阻力”区际产业转移作用力系统,从推力因素、拉力因素、阻力因素等三个维度对产业转出地和产业承接地的产业转移作用力进行系统性分析,并据此提出有序推进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改进策略。

关键词 区际产业转移 “推-拉”模型 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协调发展

引言

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发生了五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①总体来看,前四轮产业转移呈现出由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的发展态势。21世纪初发生的第五轮产业转移却呈现出产业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双向转移的新形态。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伴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亚洲国家的要素成本相比中国更具比较优势,这导致布局在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比较典型的是以鞋类、头饰类、玩具类产品为主的纺织服装产业。2011年作为全球最大的

制鞋企业,宝成国际集团在中国大陆的产能占比尚有47.4%。^②但近十年来,为配合品牌客户的订单配置和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宝成国际集团逐步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产能转移到越南和印尼。2020年,宝成国际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制鞋产能份额下降到11%,而越南和印尼厂区制鞋产能占比相应提升至46%和39%,东南亚制鞋产业已抢走中国大陆30%左右的订单。另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就业不足和虚拟经济依赖较重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高端制造业呈现向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回流的态势。比较典型的是芯片产业。为推动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政府于2022年8月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拟投入520亿美元资金,用于对在美的芯片企业的补贴和促进相关行业的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项目号:21ZDA007)的阶段性成果。

发展。同年12月,台积电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美元建厂生产4纳米和3纳米芯片。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分别于2000年、2003年和2004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为了配合三大战略的实施,中央政府和省市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成效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产业大规模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的现象并未出现。^③在经济全球化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第五轮产业转移浪潮中面临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和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④对于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为避免部分产业外迁带来产业空心化的风险,^⑤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渐次转移,争取在梯度转移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协调发展,这应是当前中国区域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然而,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为何在中国内部大规模的区际产业转移并未发生?推动产业区际转移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换言之,哪些因素有助于推动区际产业转移,哪些因素延缓或阻碍了国内的区际产业转移?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出发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等举措,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产业转移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必将在新时期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充分发挥产业转移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有序推动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动力(推力和拉力)因素,即促进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驱动力有哪些;其次是阻力因素,即阻滞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因素有哪些;再次是作用力系统,即如何构建一个包含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在内的区际产业转移作用力系统的分析框架;最后是改进策略,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动区际产业有序转移的政策建议有哪些。

文献综述

学界对产业转移现象给予持续关注,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首推的是麦克劳林(G. E. McLaughlin)和罗伯克(S. Robock)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产业为什么会转移到南部》。^⑥他们的研究对20世纪中期美国制造业转移的现象(主要是从美国东北部转移到美国东南部)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战争因素、贸易协会干预等是推动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转移到东南部的重要原因。随后,国内外学者从多个层面、不同维度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和影响因素。概括起来,学者们关于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由于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距会引起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这种差别形成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使得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⑦杨小凯和博兰提出了Y-B模型(Yang-Borland model),强化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⑧在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日本经济学家在对本国产业发展和转移的观察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产业转移理论,如以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为代表的雁行模式理论。^⑨总体而言,尽管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是着眼于国际分工和贸易方面的分析,但这种分工和贸易理论隐含了对产业转移现象的分析。

古典经济学的产业转移研究认为,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是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追求,其代表性的理论是古典区位论。该理论是在吸收了比较成本学说、地租学说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因其理论核心是企业根据生产成本最低确定最优生产区位,也被称为成本学派。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包括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⑩和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古典宏观区位理论形成,其代表性成果是艾萨德(Walter Isard)于1956年出版的《区位与空间理论》。^⑫根据新古典区位理论,在“理性人”假设下,企业往往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产品生产,当企业现有区位不能实现盈利或者其盈利

预期低于目标区域时,就有动力从当前区域迁移到新的目标区域。国内研究表明,要素成本差异也是当前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⑬事实上,基于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迁移理论的研究成果隐含一个重要前提,即企业具有完备的市场信息和知识,且具有经济理性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在产业转移实践中,企业大多是在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经营管理决策,利润最大化有时也并非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研究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决策,成为解释产业移动因的又一重要视角。在企业迁移行为理论学派看来,由于决策者通常并不具备完备的知识,他们进行关于企业迁移的决策时,想要了解所有可能的结果和途径是不可能的。由此,西蒙(H. Simon)基于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建立了公司行为理论,用“合适行为”替代“最优行为”。^⑭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影响企业迁移的非经济要素研究成果开始涌现。1987年,奈科斯丁和泽莫(R. A. Nakosteen & M. A. Zimmer)从企业迁移视角探讨了产业转移问题,并把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分为推力、拉力和阻力。^⑮总体来看,基于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企业迁移行为理论对企业迁移动机的系统研究,对基于完备信息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迁移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但该理论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与古典迁移理论相似,它更多的是从静态角度进行分析,对区位因素给予了较多关注,但是对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投资决策和企业扩张过程关注度相对较少。同时,这一理论还缺乏适用性强的解释模型。

鉴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的不足,一些学者尝试从文化制度和社会环境角度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因问题,由此形成了区位理论中的新制度学派。该学派假定,社会因素、文化传统、价值系统等共同推动空间经济形成过程。在这种假设前提下,该学派研究的重点是政府以及相应的体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这一学派以潘伦巴格(P. H. Pellenberg)等为代表。^⑯

综合以上分析,产业转移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经济现象。总体而言,学术

界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较为成熟。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可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多是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展开,关于市场机制尚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尚不丰富。第二,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国际产业转移居多,而对一国内部,特别是大国内部区际产业转移现象研究尚不深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各省区市之间以及省内各市县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梯度差异。而处于高梯度的发达地区在经历了经济的率先发展之后,并没有像理论上预期的那样向处于低梯度地区的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学界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围绕区际产业转移作用力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这正是本文的贡献所在。

区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力系统: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影响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因素众多,学者们的划分方法也各有不同。本文借鉴的“推-拉”模型(亦称“企业迁移决定模型”),尝试构建一个改进后的“推力-拉力-阻力”区际产业转移作用力系统性分析框架。在企业迁移决定模型中,奈科斯丁和泽莫将发展空间、通达性和劳动力市场等视为企业迁移的推力因素,将区位条件视为企业迁移的拉力因素,并将维持现有劳动就业关系视为企业迁移的阻力因素。在这里,我们沿用推力、拉力、阻力的划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产业转移的各种作用力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取决于企业基于成本收益比较所作出的微观决策,也会受到当地政府政策的宏观影响。为此,研究需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维度对区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力进行系统分析。具体而言,产业转出地的推力因素可以从要素成本、产业转型、市场扩张等三个层面进行刻画;产业承接地的拉力因素可以从营商环境、要素成本、市场需求等三个层面进行刻画;阻力因素则既存在于产业转出地,也存在于产业承接地,可以分别从产业转出地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沉没成本以及产业承接地的产业配套、市场体系建设等层面进行刻画。

（一）产业转出地的推力因素

1. 要素成本上升的推力

区域之间生产要素成本的差异是企业进行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从理论上而言,企业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作出迁移决策。只要迁移后节约的成本足以弥补甚至超过迁移所带来的费用支出总和,企业就有动力推进产业转移。^①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企业利润如果长期低于预期盈利水平(比如企业所在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那么,这些企业也可能会考虑迁往其他成本更低的地区,以使企业盈利重新达到预期盈利水平。要素成本的区际差异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国际产业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的重要原因,也是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企业基于“腾笼换鸟”需要主动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和用工成本大幅上涨,导致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在用地成本方面,如果以商品房销售价格近似衡量产业用地成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除河北、山东和辽宁三省外,东部地区其他省市商品房销售价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其2020年商品房销售均价为37665元/平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82倍。在用工成本方面,如果以居民可支配收入近似衡量职工工资(劳动力成本),那么除河北和海南两省外,东部其他省市的劳动力成本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而易见,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必然会增加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从而导致企业作出迁移决策。^②需要说明的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只能是本国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低梯度区域。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要素成本更低的目标区域。这是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和南亚等国转移而没有顺次向中西部转移的一个可能解释。

2. 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力

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使本国或地区的市场需求结构产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比如,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人们对医疗保健、休闲养生、高科技产品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对于食品、纺织

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增长乏力。需求结构的变化最终会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供应结构上。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将逐步把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而促进产业转出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学界通常采用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国内看,2021年,二三产业比重大于95%的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它们均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省市。对于这些东部省市而言,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将是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在生产空间受限和环境保护趋严等多重压力下,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将面临转移或关停的严峻压力。

3. 市场份额扩张的推力

扩张市场份额的需要是企业进行迁移的内在动力。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推动企业规模增长往往采取的是“原址扩张”的方式。但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原址扩张”方式将不能满足企业市场份额扩大的需求。为此,企业需要更多采取“异地扩张”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其他地区的投资机会,扩大销售市场份额,优化生产地或销售网络的空间布局。企业异地扩张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在新址建立生产加工点、在新址建立产品销售网点等多种方式。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企业迁移行为,为数众多的都是基于扩大市场份额所作出的自主性选择。有调查表明,浙江省的企业进行区域转移的最重要动机是扩大销售市场份额和增加出口。^③在珠三角企业迁移决策中,因为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因素造成的迁移占比为43.8%。^④

（二）产业承接地的拉力因素

1. 营商环境改善的拉力

区域竞争力大小不只体现为要素成本和政策方面的“硬环境”优劣,还更多地体现为营商“软环境”的优劣。有研究表明,从总体上来看,产业承接地的营商软环境要优于非承接地。^⑤目前,学者们普遍使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营商环境的优劣。从2003年开始,世界银行定期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排名并公开发布研究报告。成本的高低、办理时间的长短和办理程序的繁简是世界银行衡量营商软环境优

劣的重要因素。各国或地区可以通过简化办理流程、减少办理时间、降低办理费用等方式来改善本地区的营商环境,这有助于吸引外来企业在本地入驻。此外,开放程度也是衡量营商环境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高,往往意味着该地区具有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营商环境和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竞争氛围。因此,目标地区的开放程度是企业寻找新发展空间时的重点考量要素。区域开放程度越高,对区域外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会越大,当然,也更加有利于该区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承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有助于加快本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2. 要素成本较低的拉力

要素成本高企是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推力因素。对欠发达区域而言,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则构成了产业转移的拉力因素。一般认为,在生产要素越丰富的地区,市场供需机制作用下的要素成本必然较低,因而容易吸引外部企业的迁入。当然,生产要素的类型不同,对承接的产业类型将产生不同影响。^②比如,劳动力资源丰富裕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入,自然资源丰富裕的地区更容易吸引资源依赖型产业的迁入。与要素丰裕度密切相关的一个指标是要素价格。通常情况下,要素越丰裕,其市场价格越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也相应较低。因此,那些要素资源丰富裕、要素成本低的地区就具备了较强的承接外来产业转移的拉力。

3. 市场需求增长的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量决定了企业或产业发展的规模。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越大,相关企业就越容易获取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企业必然会作出迁移到市场需求增长潜力较大地区的决策。2020年,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5.8%、27.2%和7.0%,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仅占全国的23.5%、20.9%和4.6%。居民人均收入不高是其购买力低的主要原因。据统计,上述三大地区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4.4%、79.0%和87.8%。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人均收入不高、购买力提高有限的多重约束,叠加全球经济放缓,造成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市场需求规模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这影响了其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效能。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不同产业关注市场需求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比如,对于直接消费品行业,其作出企业迁移决策关注的重点必然是目标区域的收入水平和年龄总体结构。对于不能用作直接消费的行业,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则成为企业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三)产业转出地、承接地的阻力因素

1. 产业转出地的阻力

对于产业转出地而言,促使企业继续留在本地的各种因素可统称为产业转出地的阻力因素,重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依赖。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集聚的特征。这种集聚效应具体表现为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和群迁效应。所谓“示范效应”是指先迁入企业如果获得成功,将为其他企业产生示范效果,带动其他企业效仿。所谓“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中龙头骨干企业的入驻,将带动上下游相关或者配套企业的跟随入驻。所谓“群迁效应”主要指企业为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区位选择上采取扎堆集聚的策略。^③更进一步分析,这种集聚一旦形成,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产业发展上的路径依赖。在集群发展态势较好的地区,企业嵌入原产地生产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越深,其发生产业转移的成功概率越小。其二,沉没成本的存在。当一项资产的专用属性较强,特别是地理专用属性较强时,则比较容易形成企业发展的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就会慎重考虑“去留”问题。一般来说,沉没成本越大,企业作出迁移决策的动机就越小。

2. 产业承接地的阻力

对于产业承接地而言,排斥外来企业入驻本地的各种因素可统称为产业承接地的阻力因素。其中,产业配套不完善和市场体系不健全是阻碍承接产业转移的两个重要因素。在产业配套方面,众所周知,产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只有那些能够为转出产业提供良好配套条件的地区,才最有可能成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集聚地。然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产品结构粗放、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欠发达地区的很多产业部门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导致产业配套能力较弱,从而阻碍了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市场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观念薄弱往往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共性特征,也是阻碍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市场制度上,阻力体现为欠发达地区的要素流动往往因各种隐性壁垒的存在难以实现自由流动,资本市场的建设往往比较滞后,政府干预市场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在思想观念上,则体现为市场经济观念还比较淡薄,竞争观念、开放意识、信用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综合以上分析,区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力系统可用改进后的“推力-拉力-阻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描述(图1)。我们认为,区际产业转移

的作用力系统是在宏观和微观多种因素影响下由多种作用力构成的复杂综合系统。产业转移既受到企业所在地的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影响,也要受到企业迁移潜在目的地的拉力因素和阻力因素影响。企业是否进行产业转移取决于以下两个力的大小:一是由企业所在地(产业转出地)推力因素和企业迁移潜在目的地(产业承接地)拉力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净推(拉)力”;二是由企业所在地和企业迁移潜在目的地的阻力因素汇总形成的总阻力。只有当企业所在地的推力和企业迁移潜在目的地的拉力综合形成的净推(拉)力大于企业所在地和企业迁移潜在目的地汇总形成的总阻力,企业转移才有可能发生。在其他情况下,企业往往保持观望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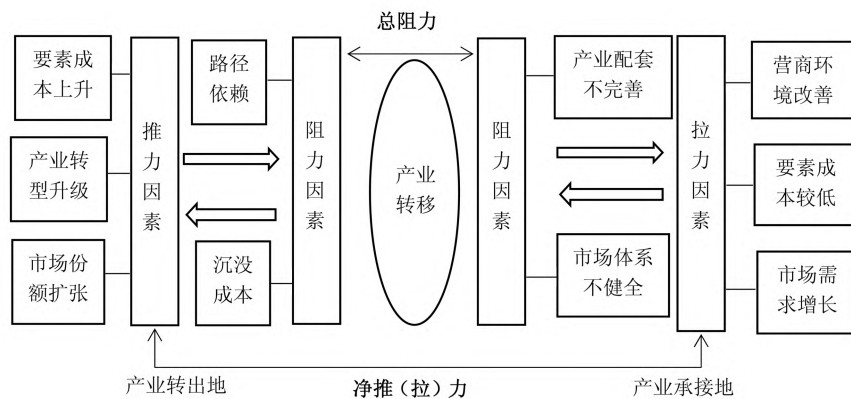


图1 区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力系统

有序推进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改进策略

探讨区际产业转移作用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及运行情况,对于促进新时代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形成的净推(拉)力大于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的总阻力,才能推动产业转移的实际发生。客观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在要素成本上升、产业转型升级等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已具有较强的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观意愿,但在现实中我国境内却未发生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这一现象的形成应该缘于产业转移的阻力因素,这些阻力因素既来源于产业转出地,也来源于产业承接地。循着这一逻辑思路,推动区际产业转移应该着眼于破解东部地区

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健全和完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市场经济体系三个方面的目标任务。基于此,本文对有序推进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提出如下改进策略。

(一)推动集群式产业转移

从产业承接地的角度分析,通过完善和延伸产业承接地的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对转移产业的“集群式承接”,可以有效破解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产业承接地如能充分利用自身在要素成本、能源资源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推动迁入企业与本地生产要素有机融合,同时对产业配套、市场环境等方面进行完善,即可使产业承接地形成与产业转出地同样有效的产业集聚效应,并带动本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进而发挥集群内核心企业的示范与带动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的

生产企业、研发机构、服务机构向产业承接地进一步集中,最终实现产业承接地的集群式发展,并逐步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

(二) 提高产业配套能力

实践表明,产业配套能力越强、产业链越完善的地区,对外来产业的吸引力越大。在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方面,考虑到产业园区是我国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关部门应以产业园区的产业配套能力提升为主攻方向,重点围绕园区支柱产业和重大项目,梳理产业链重点企业名单,准确把握企业的核心诉求,进一步完善政策响应机制,加强对企业在用工、用地、资金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注重以“补链”方式构筑和强化产业承接地重点产业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通过强化相关支持政策完善产业链支撑体系,以产业集群的集聚优势和产业配套的完善优势增强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

(三) 培育和发展中心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言,其重点在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壮大。当前,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心城市规模偏小、带动力不强,制约了其产业转移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加快提升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为产业转移提供有力经济支撑。一是提升中心城市发展规模。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通过加大重大项目、重大投资在中心城市的布局显著提升中心城市经济总量。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内河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强化和提升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枢纽地位。推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显著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水平。

(四)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优劣,是衡量市场体系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减少产业转移的市场阻力,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应致力为促进区际产业转移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保障并实现各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首要前提是实现政策公平,要彻底清理各级政府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上的价格干预政策,尽快实现同等要素合理定价,使企业真正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公平竞争。在此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实现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简政放权,构建面向所有企业的普惠性产业政策,有效减轻企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税费负担,破除产业转移的隐形行政壁垒,实现产业转移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自由流动。^④

(五)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统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推动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需要系统谋划、循序渐进,首要任务是推动区域政策从倾斜性向功能性转变,以实现区域的整体性发展和协同性发展。要加强各省市之间的横向联系,引导和推进省际、市际构建基于“区际协同、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产业转移常态化合作机制,引导各地区基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合理分工、优化发展,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优势互补。^⑤

- ①岳圣淞:《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 ②杨枝煌、陈尧:《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基本特征、主要问题及提升策略》,《国际贸易》2022年第11期。
- ③参见刘嗣明、童欢、徐慧《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困境寻源与对策探究》,《经济评论》2007年第6期;刘友金、吕政《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经济动态》2012年第11期;严立刚、曾小明《东部产业为何难以向中西部转移——基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的解释》,《经济地理》2020年第1期。
- ④李玉举、刘振中、何杰锋:《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特征、驱动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气候模型”(CLIME)的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 ⑤闫冰倩、田开兰:《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布局演变对中国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2期。
- ⑥G. E. Mc Laughlin, S. Robock, *Why Industry Moves South: A Stud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cent 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the South*, Kingsport Tennessee: Kingsport Press, 1949, pp. 126 - 132.
- ⑦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69.
- ⑧Yang XiaoKai, J.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No. 3 (1991), pp. 460 - 482.
- ⑨K.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No. 2

- (1962), pp. 3 - 25.
- ⑩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 ⑪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 ⑫沃尔特·艾萨德:《区位与空间经济:关于产业区位、市场区、土地利用、贸易和城市结构的一般理论》,杨开忠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⑬桑瑞聪、刘志彪:《中国产业转移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财贸研究》2014年第6期。
- ⑭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 ⑮R. A. Nakosteen, M. A. Zimmer,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Migration by Manufacturing Firms”, *Economics Inquiry*, Vol. 25, No. 2 (1987), pp. 351 - 362.
- ⑯P. H. Pellenbarg, L. J. G. Wissen, J. Dijik, “Firm Migration”, In P. McCann,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p. 110 - 148.
- ⑰杜传忠、韩元军、张宪国:《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及粘性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⑱参见 M. Klmienko, “Competition, Matching, and Geographical Clustering at Early Stages of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 56, No. 3 (2004), pp. 177 - 195;
- 李雯轩、李晓华:《新发展格局下区域间产业转移与升级的路径研究——对“雁阵模式”的再探讨》,《经济学家》2021年第6期。
- ⑲陈建军:《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结合浙江10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的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
- ⑳刘力、张健:《珠三角企业迁移调查与区域产业转移效应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8年第10期。
- ㉑过晓颖、朱菲:《营商软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转移的影响——基于30个省级横截面数据的经验研究》,《产业创新研究》2019年第9期。
- ㉒孙晓华、郭旭、王昀:《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18年第5期。
- ㉓魏后凯、白玫:《中国企业迁移的特征、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
- ㉔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树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志彪,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南京,210004
(责任编辑:丁道文)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Push-Pull” Model

Wang Shuhua, Liu Zhibiao

Abstract: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lowing globalization and sluggish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China’s economy is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returning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low-end manufacturing transferring to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The orderly promotion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an improved “push-pull-resistance”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force system. From the push factors, the pull factors and the resistance facto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force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destin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destin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orderly promoting China’s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push-pull” mode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